

二〇〇三——二〇〇四年度海南省社会科学研究资助

重点课题

二〇〇三——二〇〇四年度海南省社会科学学科建设

重要成果

丘濬海瑞评介集

The Review of Qiu Jun and Hai Rui

朱逸辉 主编

海南省诗书画家联谊会编

海南出版社出版

二〇〇四年六月

丘濬《大学衍义补》 及其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影响*^①

朱鸿林

(一)

明代海南琼山出生的丘濬(1421-1495),学问博大而精深,文章丰富而充实,著述多而影响大;在明末有份量的学者官员们看来,他是本朝少数学问上真有成就的士大夫,而同时也不是全无争议的政治人物。丘濬的学问,他的生卒年份,他的《明史》本传的错误之处,他作为朝廷大员的相关行事,从本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有学者认真加以研究。他所写的教化性传奇《五伦全备记》,有人已从现代的观点加以批评;他的儒家经济思想和法律思想,以及他的道德史学,也都有近代的研究给予探讨。1980年代,还出现过两篇专门研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其中朱鸿林的一篇,研究了他所著的经世巨著《大学衍义补》的著作背景;李焯然的一篇,研究了他的政治和历史观点。作为历史人物的丘濬,他的重要性是多方面的;但他在历史上最悠久的贡献,则无疑是他的经世思想和经世学术。近世中国经世之学,是晚近中国史学界相当关注和投入研究的课题,因此我们可以预测,对于丘濬经世思想和论著的研究,应该是方兴未艾的。

本文以下将先给予《大学衍义补》一个综述,然后证示此书在十六、十七世纪中国知识界里,曾经备受重视,对于留心世道之人和学古入官之士,都产生过明显影响。论文希望透过这样的述析,反映出明人对于经世之学的着实致力,同时让我们看到,此书所揭示的学问,其所关心

^① * 本文是作者的英文论文“Ch'iu Chün's Ta - hsteh yan - yi pu and Its Influence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的中译,原文刊于 Ming Studies 第 22 号(美国,1986 年秋)。中译由作者执笔,于原文稍有修订,为省篇幅,原文注释除偶有散入正文者,均从省略。

在于求取能够应用于实在政治社会问题的实在知识,而从明代思想史来说,这种经世之学实际上是和以关注身心修养为主的心学并行的。

(二)

《大学衍义补》所述论的,都是国家和社会藉以长治久安的治平之道。丘濬在 1470 年代的成化年间著作此书时,他怀有这样的思想和理念:明朝已在病中,但只要不久将来有正确的诊断和有效的处方,其病痛是能够治好的。在《大学衍义补》的序文中,他事实上给治理国家事情和医疗疾病事情作了一个这样的比喻:一方可以疗一证,随其方以已其疾,惟其所用之何如也。”《大学衍义补》此书想要贡献的,正是丘濬认为足以治好明朝当时所面临的种种病痛。职是之故;丘濬的著书目的是双重的:他一方面期望此书能够成为明朝君臣的治国学问的参考书,同时也期望它能够作为推进改革明朝时弊的蓝图。从这点看,他的眼光和志概都是相当远大而实在的。

历史的事实显示,丘濬将《大学衍义补》作为政治改革蓝图的目的是,并没有真的成功达到。但此书所表现出来的学问,却使到它真的成为常被利用的经世之学参考书。作为一个对历史和对时政都有深刻认识的士大夫,丘濬的著书方法是时事观察与文献研究同时参稽比较。这方法的应用结果,令丘濬能够从历史脉络之中来对世情时事进行论述,将政治和社会问题的演化情形清楚而有据地呈现于读者之前,因而也令他的议论易于为人接受,他的判断能够取信于世。明孝宗皇帝在接纳此书时,便曾有过这样的批答:“考据精详,论述赅博,有补政治。”这个称许广为后代所接受,即使对丘濬常有苛评的《四库全书》馆臣也不例外。从丘濬的著书意旨和此书的具体内容来看,我们实可视《大学衍义补》为一本有实证内容,有政治和社会后果,有用于其读者的实用之作。

《大学衍义补》顾名思义是补充南宋名儒和名臣真德秀(1178-1235)的《大学衍义》之作。如众周知,真、丘二书同以《大学》的八条目为其论述的组织架构,而真德秀推衍和填实的只及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六条目,丘濬则补充了治国、平天下二条目。但二书的

格式虽然基本相同,其内容以及对于达致治平之境的假设却殊不一致。真、丘二人固然同以经史诸子及历朝故事为据,但对于引据所欲达到的目的却有不同。真氏的目的在于给帝王(具体的对象是宋理宗)作道德提升,丘氏的目的则在于使有效的政府功能得以完成。《大学衍义》的基本假设是:只有(或只要)当人君已经正心、修身和齐家时,政府才能秩序整然地运作。《大学衍义补》则认为,如果人君与人臣不能同时也具备对政府功能方面的应用知识,《大学衍义》的假设的有效性是不能确保的。用理学家的词汇来说,丘濬认为《大学衍义》和《大学衍义补》存着这样的差异:前书说的只是治平天下之理和本体,后书说的则是治平天下之事和功用。丘濬认为理与事、体与用是分不开的,但却特别强调事与用的重要性,因为当没事可成时,理之为理也就无从显现;当功用不能发挥时,本体也就不能证明其为本体。用知行观念来分析时,则前书主于知而后书主于行。丘濬的知行观本于朱子(1130-1200),主张知先于行而行重于知,因此《大学衍义》所言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却是像《大学衍义补》一样的,指出及论述达到治平境地所应做的具体事情。这种兼备理论和实践之道的学术,用当时的话说,便是所谓的“明体适用”之学。

真、丘二氏之所以所见不同,原因之一是彼此的著书背景不同。真德秀在强迫休致的处境之下著书,当时的宋朝处的是主弱臣强的局:被真氏认为可有作为而意志薄弱的宋理宗皇帝孤弱于上,受制于专威诡诈的杨太后和权相史弥远及其党与;真氏著书的特定读者就是理宗皇帝,他的著书目的直接在于提升理宗的道德力量。丘濬著书于国子监祭酒任上,前此他官至翰林学士,目睹明宪宗皇帝对于朝政日趋退避,经筵讲论也流于具文,《大学衍义》虽然尽人皆知,皇帝本人却难以空言相动,因此丘氏对于致君之道,也就别有看法。丘氏既然身为天下学子之师,直接负有为朝廷栽培官员之责,间接也负有应对皇帝询问之责,他的读者实际上可以包括了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阶层的所有成员,因而他要照及的是整个国家制度、政府运作和社会情况的问题;而由于此时的明朝政府因庞大笨拙、松懈无力而显得前景不明,丘氏须要论述的事情和照顾的方面,也不得不远较真氏须要论述的为繁复。在这不同背

景之下,尽管丘濬基于理论和实际原因,声称自己所著只是补充真氏所作,读者们事实上却都将《大学衍义补》视为独立而自具体系,能为为政者提供实际指导之作。

(三)

《大学衍义补》全书160卷,由12个子目组成,这些子目,除了最后一个之外,各含若干细目(又称“条件”);各个子目所含细目由6个至16个不等,全书一共有细目119个。在160卷的本书之前,还先置补《大学衍义》一卷;此卷题作《诚意正心之要》,只有“审机微”这样一个子目,它发挥的是“审机微”的义理和方法。

“审机微”这个命题,是《大学衍义》所没有特设或足够处理的。《大学衍义补》以这个命题作为一书的开始,这本身便清晰地显示了丘濬所主张的,正是程朱所揭示的学术传统。“审机微”含有这样四个细目:“谨理欲之初分”,“察事机之萌动”,“防奸萌之渐长”,“炳治乱之几先”。这些细目所论析的内容,是提醒帝王保持心体清醒,用以裁断和处理政事之道。“诚意正心之要”这个题目以及它在书中的位置,反映了丘濬肯定了真德秀所提倡的以帝王身心自修为本的治国之道,同时也反映了他强调帝王在治理国事上的应变能力。就“存天理,去人欲”的事情而言,丘濬认为“然用功于事为之著,不若审察于机微之初,尤易为力焉。”从处理事情的本末先后的原则而言,丘濬和真德秀的主张并无二致。

可是,《大学衍义补》本身的内容,却传达了丘濬对于真德秀所提倡的帝王治国之学的路向的不满,也传达了丘濬自己认为的帝王治国之学所应包括的实际知识。《大学衍义补》第一个子目题作“正朝廷”,之学所应包括的实际知识。《大学衍义补》第一个子目题作“正朝廷”,共有4卷,论述的是朝廷中央层级的一般施政原则。第二个子目题作“正百官”,一共有8卷,处理了任官和给职、订定职品和爵禄、铨选和考课,以及礼敬大臣等事情的原则和具体事项。这两个开头的子目所包括的论思,实际上就是与处理中央官僚系统的人事方面最有关系的知识和方法。

接着的两个子目,包含了与国家经济和财政规章有关的详细讯息,

以及很多有远见的改革或修订现行政策的方案。第三个子目题作“固邦本”，共有7卷，谈的是从经济视角怎样治理社会的基本问题。第四个子目题作“制国用”，共有16卷，详细论述了国家岁入和支出、赋役赋税、钱钞专卖、运输与土地发展等等事情。这些论述反映了明朝直至1480年代的经济处境。以上这两个子目所包含的资料，不独为研究治国之道者所垂青，也为经济思想史家以及专研十四和十五世纪经济情况的学者所留意。

以下三个子目关系的是礼乐教化之事。第五和第六两个子目，主要论述的是国家礼仪的治国功能；论述及于礼仪对于官僚层级的厘定，对于官吏阶层的凝聚，以及朝廷所施教化之道对于社会的影响。第五子目共含18卷，题作“明礼乐”，详细铺陈朝廷及地方各级政府的礼仪功能，以及有官之家和乡里社区的社会义务。第六子目共有13卷，题作“秩祭祀”，论述了国家对于正祀诸神、明朝祖宗、孔子等应有的礼仪以及祭祀事情。第七子目题作“崇教化”，共有18卷，主要论述的是各级学校制度以及各种基本教法，大旨在于崇尚儒学尤其理学的教旨。

第八子目题作“备规制”，共15卷，述论各种公家建筑和设置，各种章服器用，以及都邑防守、邮传设备等在国家治理上的意义。

第九子目题作“慎刑宪”，共有14卷，从各方面论述了中国的法律理论，司法制度，以及法制施行的历史。这个子目是本书最重要的子目之一，历来都受注意。二战之前，日本名学者佐伯复堂曾将它译注成《支那历代刑事法制思想》一书。（鸿林按，中国学者方面，近年鲁嵩岳也出版了《慎刑宪点评》一书。）可以说，“慎刑宪”此目本身已成了中国法律思想的一个经典文献。

第十和第十一子目都和军事、国防有关。第十子目题作“严武备”，共有29卷，述论不但及于兵制和兵政，还及于武器和战略战术等方面。第十一子目题作“驭夷狄”，共有14卷，内容包括对付异族入侵者以及绥靖边疆民族的战略和战术、边防政略和情报搜集等。整体而言，这两个子目提供的是，从儒家立场和从守势观点出发而考虑的维持国家武力和保障领土完整的重要事情。

最后一个子目只有4卷，题作“成功化”，大部份是理论之言。它衷

集了新儒学中的治国理念，列示改变帝王道德、官僚体系以及社会整体，使之达到古人曾经期望而尚未达到的理想境地之道。

《大学衍义补》的内容以及它的论述次序，表明了此书所趋向的是制度问题，而其构思则以明朝当时的政制为基础。第一子目和最后子目所论述和处理的，都是帝王本身的直接责任。中间所论述和处理的，则是明朝中央六部所属的活动。本书的公开目的是为皇帝和百官提供令他们能够胜任治国之事的基本知识；即使仅就此点而言，本书已不单只是一本“帝王之学”之书，它其实是一本君臣均可共学共用之书。

《大学衍义补》的取材，自然也限制了其读者所能获得的知识。本书的取材，包括儒家经典、古今诸子著作、经子注释、古今不同体裁史书、政书、古今史评、奏疏、官箴、方志、武备手册，以及明朝的敕纂书籍、祖训等等。这样取材所能提供给当时读者的知识是广泛而有用的。此书的当时读者，能够认识的是历史上的政制思想、意见和议案，是明朝直到十五世纪后期的政治、军事、社会、经济各方面的背景，以及丘濬本人在这些背景之下所形成的思想和意见，包括他所提出的多个政制和政策改革方案。

(四)

《大学衍义补》所曾发生的影响是明显而多方面的。没有另外一本明代经世之学著作有过它这样大的影响。历来对于此书的称赏，不胜枚举，对于它的批评，也不乏其数。我们都不必在此缕述其详。须要证示的是，此书对于明清两代的学术与知识取向，确曾产生影响之事。以下先举此书较为明显、较多人知的所受肯定。

成化23年(1487)此书完成进呈朝廷时，其重要性即时受到肯定。丘濬除了因此晋升礼部尚书之外，登基不久的孝宗皇帝更下令礼部，将“书誉副本，发福建布政司着书坊刊行。”官费刊行此书的目的是将它送给府县学校以备学子研读之用。作为一本有政府权威作基础的参考书籍，此书也因为内容有益有用而同样受到清初朝廷的重视。据钱谦益(1582-1664)所言，清世祖“敕是书颁行庠序，出论乡会。”此书能作为乡试、会试出题的根据，其影响程度是可以不言而喻的。

此书不只对于学子有用。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里,十六世纪开始的重要经世学者都承认了它对经世之学的重要贡献。王圻(嘉靖44年、1565进士)便在他所编纂的政治百科全书式巨著《续文献通考》中,多处引用《大学衍义补》的文字。《大学衍义补》的引文,也大量见于明代最大和最重要的经世治国文章选集、陈子龙(1608-1647)等在崇祯年间编刊的《皇明经世文编》。《皇明经世文编》共选明人440家文字,《大学衍义补》获选文字,长达六卷,数量只有杨一清(1454-1530)以及徐光启(1562-1633)两人被选的文字能够相比。

近代学者曾经指出,代表清初新的学术潮流的重要学者,也对此书高度尊重。如方以智(1611-1671)便认为此书是经筵启沃必读之书,当代帝王欲知本朝典故事例时,当读此书,而不止于阅读《皇明祖训》。顾炎武(1613-1682)在其经世取向名著《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载录了很多此书篇章,在其《日知录》中,也屡有引录。以上情形都指向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大学衍义补》在明末清初的思想和学术界中,有过实在影响。从以下所证示的,我们更可见到此书之巨大影响,其实由来已久,自其刊行便已不断。

(1)《大学衍义补》的刊行历史

《大学衍义补》的影响,首先反映于它的杰出的刊行历史。此书首刊的弘治元年(1488)刊本,由朝廷下令刊于福建建宁府书坊。在以后直到明亡的一个半世纪中,它在中国至少出现过八个刻本,这些刻本都有文献可稽,多数还有存本可见。当中首出的四个刻本,都刊于福建地方:两个刻于弘治元年至嘉靖12年(1533)之间,一个刻于嘉靖12年,一个刻于嘉靖38年(1559)。嘉靖38年本是福建巡按吉澄下令与《大学衍义》同刊的合刻本,有校者宗臣序言。此后又有一个小字本,大约刊于万历22年(1594);另一刊本刻于隆庆元年(1567)至万历33年(1605)之间。以上两本的刊地不明。万历33年,明神宗令司礼监刊刻了一个内府本;实际的刊刻事情则由司礼监太监陈矩负责。我所见着的明朝最后一个刻本,是陈仁锡在常州刊行的评本。这常州本后来成为十七及十八世纪多个翻刻本的祖本。乾隆46年(1781),此书被《四

库全书》著录,抄入全书之中。清朝至少也有过两个刻本,分别刻于道光17年(1837)和光绪21年(1895)。在中国的帝制时期结束之前,此书还有两个域外刊本。根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1487年朝鲜国王曾经下令刊刻。日本则有1792年(日本宽政4年,清朝乾隆57年)的篠山藩刊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也有两个版本出现过。其一是1931年的海南海口排印本,另一是1972年台湾丘海学会印行《丘文庄公丛书》内的弘治元年本影印本。照我所知,迄今1985年为止,现存《大学衍义补》的不同印本还有十四种之多。此外还有一个明抄本。这个不断刊行的记录,清楚显示此书之受欢迎,而在明代尤其广泛被人阅读的事实。我们可以有根据地说,明代同样部头的非文学性书刊中,以此书流传最广和印行最频。

(2)《大学衍义补》的节本

《大学衍义补》广受读者欢迎的事实,也由它的众多节本获得印证。嘉靖38年福建刊行宗臣校本《大学衍义补》的同时,徽州学者江文武也刊行他删节真德秀原著的《大学衍义辑要》(四卷),并在刊本序中交待了自己删节《大学衍义》之故说:“顾其(指《大学衍义》)意主于讽戒其君,篇章训释,取必详悉。近惟《补》(《大学衍义补》)文有节本,学者犹相与诵习,而《衍义》无之。”这段说话表明了二事:其一是,真、丘二书文繁而理奥,学子须要节本以助掌握要义。其二是,真、丘二书虽然同样重要,但学者对于《大学衍义补》兴趣较大,因为(或者说因而)后者“近年”有节本流行。

江文武所言,正足反映《大学衍义补》在十六世纪前半期的影响。此书不只对于身负政务的官员有意义,对于学古人官的士子们更有意义。因为书中所载,大有利于科举考试之准备,正如江文武《大学衍义辑要》的跋文所说一样:“其辑之何?删其繁以为举业者设也。”《大学衍义补》对于八股制义之作,固然无助,但其所载经世治国的知识,对于应对不用八股文表达的经史时务策,却极有帮助。八股文对于科举入选之事,无疑重要,但科名之高下,却往往决定于对策的表现。《大学衍义补》所载的经史治道知识,以及明朝时务问题的述析与解决之道,对于

策学最有帮助。以此之故,《大学衍义补》对于众多的士子而言,实有一种“草根性”的影响在,其影响实不限于有官有职的士大夫阶层。

江文武所谓的近年《大学衍义补》节本,应该指的是嘉靖中后期顾起经(活跃于1550-1560年)的《大学衍义补要》(卷数未知)以及徐斌(1519-1581)的《大学衍义补纂要》,而更有可能指的是徐氏之作。徐氏的节本共有六卷,嘉靖36年(1557)首刊于福建,隆庆6年(1572)重刊于江西。此书有这样的特别体式:它将删节出来的《大学衍义补》文字,依照明朝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分配,分科归属。这个小小的形式变动,毫不含糊地反映了时人对于《大学衍义补》此书的性质的看法:此书就是认识中央政府功能的参考书,因而它被认为与获取行政知识之事有关。

实际上,《大学衍义补》的节本在顾起经和徐斌两人所作之前已经出现。现知最早的节本,应是程浩(弘治12年、1499进士,约终正德10年、1515)正德中所纂的《大学衍义补会要》。接着的是杨文泽(嘉靖4年、1525举人)纂于嘉靖21年(1542)前的《大学衍义补节略》。这两个节本的卷数未知。杨氏终身只任教官,由州学正官终南京国子监助教。看来他节略《大学衍义补》的用意和江文武删节《大学衍义》的一样,为的也是方便应试的士子。

十六世纪下半期至少还有三个节本出现过。第一个是王诤(嘉靖29年、1550进士,约隆庆4年、1570致仕)刊于嘉靖41年(1562)的三十一卷《大学衍义通略》。这个书名有些误导,实际上此书同时节略了真、丘二书,并且附有注释。第二个是许国(1527-1596)选集的十二卷《大学衍义补摘粹》。此书隆庆元年(1567)由查策刊于南京。据刊本的查策序说,此书是许国为应试而多年精读《大学衍义补》的成果,许氏嘉靖44年(1565)进士出身,也是同年会试的会魁,以此书对其成就实有帮助,故以示诸查策,查策则是查策之弟。第三个节本是凌遇之刊于万历年间的《大学衍义补英华》。(鸿林按,近又见另一明末刊刻六卷本节本。此本扉页题作“陈太史订大学衍义英华”,版心则题“衍义补赞”;每卷卷端均题“古吴明卿陈仁锡纂”;目录卷端题“丘琼山先生大学衍义补英华”,卷一卷端“英华”作“赞英华”,其余各卷卷端均作“丘琼山先生大

学衍义补赞”。此书无序跋,陈氏亦无曾纂此书之言,有可能是刊者据陈氏评论《衍义补》所及之文纂辑而成。)

随着清初帝王对此书的重视,《大学衍义补》的节本在明亡之后继续出现。据钱谦益所说,江西聂姓学者曾纂《大学衍义补删》一书三十卷,顺治12年(1655)漕运总督蔡士英为之刊行时,钱氏即应邀为之作序。另外一种则是清代名臣陈宏谋(1696-1771)纂的十二卷本《大学衍义补辑要》。此书乾隆2年(1737)初刊于云南,目的在于方便不易见到全书的边远地区学子。这个节本以后曾经多次被翻刻。

《大学衍义补》的吸引力,即使到了其内容对于科举士子没有现实用途时,仍然不断。同治5年(1866,太平天国亡后二年)河南开封重刊陈宏谋《大学衍义补辑要》的事情,对此具有很好的说明意义。刊者汉中赵培桂识语说,所以重刊此书,是因忧虑陈氏原刊本遭到咸丰10年(1860)英法联军之役以及两年前(同治3年、1864)才平定的太平天国之乱的兵燹之祸而不存。这种保存文献的行事,同时也显示了一种传之已久的思想模式:天下动乱之时,有心之士便会留心经世之学;当他们留心经世之学时,他们便会想到《大学衍义补》此书。

(3)《大学衍义补》的反应性著作

《大学衍义补》的影响,又可以从丘濬的仰慕者与批评者对此书的反应看到。丘濬的晚辈,成长于十六世纪初期的人物,对此书的反应并不一致;有些反应是直接而积极的,有些则是间接而消极的;但这些反应都同样反映了此书的实在影响。以下列举一些较为明显的例子来作说明。这些例子也有助于反映王阳明学说蔚成学派时知识界的学术观点

如前所述,《大学衍义补》包含了很多处理明朝当时的政治以及社会经济问题的建议。这些建议反映的正是丘濬个人的观点和意见。这样一来,它们自然无法为丘濬所有的同时人物所一致接受。但这些建议的影响却不容忽视;它们的实际影响,有时令到不以为然者不得不公然表示反对,以使它们所将导致的政策得予封锁或扭转。胡世宁(1469-1530)在正德年间著作《大学衍义补肤见》一事,便是这种表现

的一个事例。胡氏此书只有两卷,内容主要以批评《大学衍义补》中丘濬所提的经世方案为事。此书今日未见;据清儒卢文焯所言:“若公此书,或增成文庄之义以为必可行,或摘抉其弊以为必不可行,文庄之以微文见意与其所迁就而不敢言者,公则一一引伸而别白之。”由此可见,此书实为对丘濬所提方案的认真评论。

《大学衍义补》之影响日大,也带来了一些重新强调《大学衍义》的要求。《大学衍义》以强调帝王之修身为致治之本,《大学衍义补》则以补充《大学衍义》之未备为事。时代的实际表现却是,《大学衍义补》因为所提供的实际治国知识和为政之道,更能吸引当时的学者,《大学衍义》的影响力渐渐及不上它。认为《大学衍义》价值大于《大学衍义补》的学者,因而也渐有扭转形势的作为。杨廉(1452-1525)之纂《大学衍义节略》,便是其中的一个具体表现。杨廉此书将真氏四十三卷的原书,节略成为二十卷,嘉靖元年(1522)进呈朝廷。杨氏在其进书表中,对丘濬于《大学衍义》“病其阙而补以治平之篇”之事,大不为然。他认为,帝王之学应该重在心学,而就此而言,即使《大学衍义》也已冗长不堪。故此纂此节略,以便即位只有逾年的世宗皇帝,能够在数日浹旬的阅读讲论之间,便能掌握帝王修己治人的大道。杨廉此书及其进书表暗含了这样的理念:帝王不应多费时间研读像《大学衍义补》这样的篇幅庞大之作,这类著作对于帝王治理国家所提供的助力,只居次要作用。

在杨廉节略《大学衍义》的时代,《大学衍义补》所载的材料也引起了士大夫们的反应。《大学衍义补》载录了很多历史事情和明朝事例,用以对丘濬所处时代(十五世纪后期)的政治研究,提供比较事例和历史类推,因此所载实以“往行”为主。丘濬的著名广东后学湛若水(1466-1560)则认为,就讲论治国之道而言,“前言”一样重要,结果便有他在嘉靖7年(1528)完成的仿《大学衍义补》而作的《圣学格物通》一书。此书一百卷,所载以历史上的圣君贤臣之言为主,因而也被视为经世取向之作,并且被认为足配《大学衍义补》并传,虽然实际上其流传远不及于《大学衍义补》。

同样也是对《大学衍义补》的经世精神作出反应,并且受到丘濬的

经世主意所激励的著作,则是夏良胜(1480-1538)作于嘉靖16年(1537)的《中庸衍义》。此书十七卷,体例也仿照《大学衍义补》。揆诸时情,夏氏著书自有其充分理由。因为既然《大学》可以有衍义,和《大学》同为《四书》之一的《中庸》当然也可以有衍义。重点是夏氏之著书,实为丘濬影响之下之事。《中庸衍义》不只引载《大学衍义补》之言,夏良胜还继承了很多丘濬的批判精神;表面上此书是推衍《中庸》之作,实际上它却包含了不少对于嘉靖年间的时政的批评,正如《大学衍义补》之对十五世纪中期时政的批评一样。

还有,正如胡世宁之认为《大学衍义补》须要加以批判一样,同时人物也有认为《大学衍义》也应加以批判的。嘉靖9年至17年间,黄训(嘉靖8年、1529进士,约卒于嘉靖17年、1538)著有《大学衍义肤见》一书。此书似乎已经失传,卷数不得而知,但从书名之与胡世宁《大学衍义补肤见》可为偶对,可以推断其为同样性质之作,只是批判对象不同而已。

正德后期至嘉靖初年之间,《大学衍义补》还曾促使著名学者魏校(1483-1543)改变其知识取向。据胡松序魏氏《庄渠遗书》所言,魏氏初则致力于刑名之学,继则致力于《衍义补》的经济之学。最后乃认为《衍义补》尽管大有用于经济之学,其所示教并不及于儒者最基本的正心修身之学。魏氏因而又再转向,深造于这身心的基本之学,结果成为足与王阳明抗衡一时的名儒。

从以上所列的这些反应性著作和学问事情看,《大学衍义补》对于十六世纪前期学者产生巨大影响之事,是无疑的,不管人们对于此书所提供的知识和所揭示的学问主张是否同意。一言以蔽之,《大学衍义补》实已成为一种学术的焦点。明朝所有的经世之学著作都在其后出现,并且也都引用书中文字。

(4)十六、十七世纪中的其它反应

按照一般明代思想文化史著作所见,人们大概不敢设想十六世纪前期是能够容许《大学衍义补》产生如上所述的影响的时代。当时的显学,是以王阳明、湛若水以及两家的门人为代表的心学。此外,思想保

守的明世宗,也是以尊奉《大学衍义》著名的。嘉靖9年(1530)他曾将此书刊印并赐予科道官员。明世宗这个帝王姿势与明孝宗的截然不同。孝宗推崇《大学衍义补》,因而鼓励扶植了一种留心解决实际政事之道和留心经世之学的学术气氛。世宗之推崇《大学衍义》,不管是否出于有意,却重新强调了正心修身至上的理念。简而言之,嘉靖前期是可以被认为不利于推广《大学衍义补》所主张的那种学术的。

然而,一旦事情关系到实际问题时,《大学衍义补》始终又是适当参考之书。像杨廷和(1459-1529)与杨一清(1454-1530)这些著名的政治家,都明显地受到丘濬的学术主张所影响。而他们也只是丘濬和《大学衍义补》其人其书的仰慕者中较为有名的而已。人们对于此书及其作者的仰慕是有理由的。正如宗臣嘉靖38年所作《重刊大学衍义合补序》中所说:“丘氏书,无论孝皇(明孝宗)异之,即如我皇上中兴,神化益茂,谋国者凡有大典礼、大征伐、大兴作,辄取是书斟酌焉。”此书不独是学者常读的参考书,也是朝廷议论国家大事时的论辩基础。像嘉靖10年(1531)议论敏感的郊祀大礼时,大学士张璁便曾引用丘濬见于此书的意见,并获世宗皇帝采纳。

比这个帝王采纳《大学衍义补》的意见更为重要的是,那些不认为强调心身修养便能解决国家实事的官员们,都广泛地认为此书是重要和有用之书。他们所了解的,正如宗臣在上引序文中所说的:“所以救时之弊者,丘氏一书尤切矣。”《大学衍义补》最深刻和精彩之处,正在于它对急切的国家与社会问题的讲求。对于很多士人来说,此书是了解真实而迫切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起点,而且还是对抗日益高涨的心学思潮的杰作。事实上,行品和气节都高尚的宗臣便曾委婉地批评过《大学衍义》之不切实际。同样,著名学者薛应旗(1500-约1573)在比较真、丘二作后,虽然认为丘氏之作《衍义补》,“未免以闻见梏其心矣,”但随即也得说,“虽然,亦犹医者之集方书也,参互以用之而勿滞焉,可也,”认为读者只要能够同时参考《大学衍义》而灵活运用之,此书仍是实际有用之书。

就事实而言,《大学衍义》尽管得到世宗皇帝的崇奖光顾,其实际影响却从不及《衍义补》,虽然这二书是时常被人相提并论而有时还同时

刊行的。例如万历元年(1573)朝廷议论王阳明从祀孔庙事情时,争辩激烈,结果阳明方面的最关键支持者谢廷杰,就是引用了《大学衍义补》中对于孔庙从祀的标准说法,来作为论据,并终于在万历13年为阳明争取到从祀孔庙的殊荣。总之,真、丘二书虽然同置于各地府县学校,而论读者数目,真书总较丘书为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分子中也渐萌生了《大学衍义补》所提供的经世知识须予继续和扩大的主张。到了十六世纪末年,补充《衍义补》的著作遂告出现。最明显的一本是邹观光(1556-约1620)所著的《续大学衍义补》。邹观光是东林巨子顾宪成(1550-1612)和邹元标(1551-1624)之友,时称与邹元标齐名。此书似乎失传已久,其卷数及内容均不得而知,但推测其所载必与成化末年《大学衍义补》成书之后的明朝政事资料有关,而格式和文体也都像《衍义补》一样。值得指出的是,正当邹观光撰作《续大学衍义补》时,另一学者吴瑞登(万历14年、1586岁贡,万历46年、1618前卒)也在从事同样撰作。万历22年(1594)吴氏为其所著《皇明绳武编》作序,此书三十四卷,有个不言而喻的副题,题作“拟续大学衍义”。此书沿用《大学衍义》的子目,而以明朝掌故实之。但这个副题其实有点误导,因为它的内容其实是较为接近《大学衍义补》的。正如书前另一篇序文所言,真书所载,重在往事,而丘书有关明代之言,尚未完整,故有补续之必要。这个观点,亦为时人所共持。

踏入十七世纪之后(万历中期之后),明朝开始面对严峻的内忧外患,士人们对于像《大学衍义补》这类经世之作的研读,更见热心。真心实意的官员对于崩坏的局势的担心与日俱增,对于救济时艰之道的讲求也与日俱增,《大学衍义补》也被赋予了一种新的时代意义。丘濬的意见和议案时被重新考虑,有些还可能经过修订后付诸实行。

关于这本书的新看法也渐渐演化了出来。士人们认为它是讲求最实际的问题的最重要参考书籍,也是为了处理事情和解决问题的必读之书。认真看待它的士大夫不乏其人。天启4年(1624),南京国子监祭酒唐大章(万历35年、1607进士)上疏,请求熹宗日讲以此书进讲,以济时艰。唐氏强调,只要皇帝真欲学古以克今,则丘书所陈,必然有用。他具体地要求,每日日讲时,选取此书数节加以讲解。唐氏此书上于该

年四月,有旨《大学衍义补》进呈阅览。同年八月,又令唐大章校刊此书。由于天启年间的《大学衍义补》刻本尚未发现,我们不能肯定唐氏曾有重新刊行此书之事。同时,熹宗曾否将此书过目和认真对书中所言加以思考,都是可疑之事。当时正是魏忠贤及其群党肆虐天下之日,任何经筵日讲,最多也只能徒具形式而已。但唐大章的疏请,却反映了一些晚明有识之士对于《大学衍义补》所揭示的学术为有助于解决实际政治社会问题的认识。丘濬在十五世纪下半期所提出的问题,到了十七世纪上半期,依然有意义,依然有关系。这样看来,《大学衍义补》关注所及的,殊不限于历史上的经世知识,而实与当代的经世知识有关了。

但一旦与时代直接有关时,人们也就感觉到《大学衍义补》的不足之处,即使不认为它是过时之物。此书成于十五世纪后期,明朝自此之后的许多重要和特别的事情因此都没法提及。但由于没有其它同类之书足以取代此书,为此书作补充的要求,也就自然而然地日见增强。崇祯元年(1628),给事中宋鸣梧(万历47年、1619进士)疏请,将《大学衍义补》加以修订和补充,以使更合时用。宋氏所请,有旨准许,《大学衍义补》因而正式被承认为廷臣的必须参考书籍。

明思宗有否下令执行宋鸣梧这个补充《衍义补》的建议,因为相关的记录无从稽考,我们不得而知。但假使朝廷对此建议没有具体执行,宋鸣梧的意见却仍为同时的士大夫们所响应。与此同时,著名的陈仁锡便正在编纂其巨幅的《皇明世法录》。陈氏此编正是搜集纂辑《大学衍义补》成书之后、足以有用于认识和分析当前时政的明朝事例之作。这本以收录明代经世治国文献为主的《皇明世法录》,共有九十二卷,成于崇祯5年(1632)而刊于崇祯7年陈氏逝世之后。陈氏在此书完成之同年,如前所述,还在常州刊刻他的评本《大学衍义补》。《皇明世法录》的体裁与《大学衍义补》不相同,但陈仁锡的此书自序明言,是书之作,用意正在于补充真德秀与丘濬二书之未备。顺带可以提及的是,陈氏此书,当初并非以“皇明世法录”拟名,而是拟以“续补《大学衍义》全书”命名的。所谓“全书”,指的便是真、丘二作的全部。还有,在《大学衍义序》中,陈氏对于“数年来诵《衍义补》有之矣,未有读西山先生书而好之

者”的事实,感到不安。因为就儒学的本末先后而言,《大学衍义》所言,应该是本是先,不能忽视的。由此可见,《大学衍义补》在明末所遭遇的,是空前的备受注意。上文提及《皇明经世文编》采录文字最多的三家,《大学衍义补》正居其一,也是佳例。事实上,丘濬的名字在明末是备受尊崇和有吸引力的,投机的书坊业者,甚至冒用他的名字刊行伪书,以求销售。其中一本崇祯后期新刊的明代历史读本,名作《皇明二祖十四宗增补标题评断通纪》,扉页明题“丘琼山先生鉴定”一行,全书十五卷的卷端,也各明题“琼山丘濬鉴定”一行。按《皇明通纪》原著者为广东东莞陈建(1497-1567),生于丘濬卒后二年,书贾射利,一至于此。

(五)

以上的考述清晰显示,《大学衍义补》此书在十六世纪开始的明代有真正的影响力。它广受欢迎,读者众多,因为它为实际的经世知识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而又有现实意义的读本,同时又为关怀国家大事的人们宣示了一种实用的精神。《大学衍义补》所获得的种种反应,显示了明代的知识界从来未曾全为理学中的心学主张所统制,至少从十五世纪末期开始,为数不少的士大夫以及在学应试以求仕进的学子,都以一种有意识的努力,持续地追求着有体系的实用经世知识。而《大学衍义补》一书,则是这种明体适用之学的文字上最高成就。

这些结论有助于重新评估明代的学术成就。康熙初叶黄宗羲著作后来影响甚大的《明儒学案》,其《发凡》声称,“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独于理学,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茧丝,无不辨析,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黄宗羲所说的理学,主要指的是心学。我们从《大学衍义补》的影响的研究,则至少还可看到,明人对于日常对个人及社会有用的知识的追求,其广度和深度也都是超逾前代的。因此,如果说,明人对于哲学性地了解人之所以为人的问题大感兴趣,那么,他们也显示了以经世知识解决国家社会的现实问题的同样热心。我们唯一的问题只是,像丘濬这样的饱学志士,他们为何毕竟不能酬其所愿,使到明朝的病痛得以消除,明朝的衰弱得以康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丘濬海瑞评介集/朱逸辉主编.

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6

(海南历史文化名人选集)

ISBN 7-5443-1259-3

I. 丘… II. 朱… III. ①丘濬(1421~1495)—人物研究—文集②海瑞(1514~1587)—人物研究—文集 IV. K8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43314 号

丘濬海瑞评介集

朱逸辉 主编

责任编辑:欧大伟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海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2004年6月第11版 2004年6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30

字数:900千字 印数:1000

ISBN 7-5443-1259-3/K.3

全套书定价:280.00元

丘濬海瑞评介集

朱逸辉 主编

顾问:林明江 吴亚荣 黄培茂

朱鸿林 李养国 詹尊沂

主 编:朱逸辉

编 委:王 舜 张昌礼 何文生

海南省诗书画家联谊会编

海南出版社出版

《朱子学的》的流传与评价

朱鸿林

一、引言

《朱子学的》是明儒丘濬(1421-1495)为初学者编纂的一本朱子学说要旨的读本。丘氏自称之为“拟《论语》”之作,用意在于推尊朱子。是书从朱子的各种著作及朱子门人后学有关朱子的著作中,选辑了514节。1252则足以反映朱子学说要义和学行大端的朱子本人论学文字及学者赞述朱子的文字,依内容性质分成上下二卷,每卷十篇,每篇各取篇首或近于篇首的二字为名,如同《论语》名篇之例,表现了它“拟《论语》”的面貌。

朱子著作等身,言满天下,但却没有留下单一阐述自己全体学说的著作,丘濬透过《朱子学的》的编纂,给朱子学说提供了一个系统周延而繁简适中的读本,以利缺乏师资的学者得到深造自得的门径。这固然是他尊崇朱子和阐扬朱学的具体表现,同时也表达了他对朱子学说的理解和综结表述朱子学说的主张。《朱子学的》成于天顺七年(1463),是丘濬所撰四种与朱子学术相关的传世名著中成书最早而篇幅最小的一种,比起《家礼仪节》(成化十年,1474)、《世史正纲》(成化十五年,1479)和《大学衍义补》(成化二十三年,1487),它所获得的近代注意也相对的少。但在朱子学派的文献里,它却实长期享有显著地位而为尊朱学者所称重。

对于研究学术思想史的学者而言,《朱子学的》的重要性却还别有所在,因为它的出现,其实是朱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在一篇相关的论文中,笔者曾对此书的结构和内容有所析述,并循着南宋晚期至明初时期学者系统性综结和传述朱子学说的做法的脉络,论析了此书的编纂宗旨和理据,并且重构了此书之前同类表述朱子学说的著作的概况。其中在处理门人后学编辑朱子学说读本的一项上,对宋人叶士龙所纂的《晦庵先生语录类要》(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前后成编)、王泌

所纂的《紫阳宗旨》(理宗淳祐十二年[1252]后成编),和张洪、齐炳合纂的《朱子读书法》(度宗咸淳二年[1266]成编)这三本旨在便利初学入门以求深造自得的朱子文字选编的内容,编纂背景和成就,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但在追究这些具有代表性的纂著的流传情况时,却发现了元代朱子学者由于特别措意于朱子《四书章句集注》的阐释之故,少有从事与它们同类的编纂之事,而它们本身虽在宋元时代流行,到了明代,却变成了籍籍无闻,人间稀见。笔者因得这样的看法:尽管到了明初,朱子学说已因科举定制而变成官学,朱子学说所寓的朱子各种著述也都编辑齐备,但朱子学说其实还是表盛里衰,因为系统性表达朱子学说而能使初学掌握朱学精髓的工作,却是十分的不足。

从这个角度来看《朱子学的》在朱学发展史上的意义,论文提出了如下的结论:“它标志着朱子学者对如何传授朱学精义这一老问题的新体会和新认识,而这个新的体会和认识,至少在以后的二百五十年间,又曾发生了明显的作用。明、清二代同类的编纂,为数甚多,……但都是出现在《朱子学的》之后的。这个从文献显示出来的事实和《朱子学的》的多次刊行的事实,客观地也就显示了《朱子学的》获得肯定的程度的和在朱学发展史上曾经起过的作用,它的价值,因此可以不言而喻。”¹但由于该文限于篇幅,有关《朱子学的》的刊行史,只以结论的形式出现,未及深入析述。本文所拟交待的,便是这个在文献上应予徵信的事实,和与之有关的各种前人评价之言。

二、《朱子学的》的版本与流传情况

《朱子学的》成书于天顺七年,当时只称《学的》,大概由于所载既为朱子之言,而又传刻不一,以后遂有《朱子学的》之名。此书最初的刊行年代,已难细考,但从现存三个内容基本相同而体式明显别异的明清刻本来考察,它的流传情况,大致可以分成三个系统来予重建。

我们先从一个有确定刊刻年份的明本说起。此本题作《重编朱子学的》,刻于万历三十四年(1508),内题朱吾弼辑,卷端下镌“文公十三世孙朱崇沐订梓”,全书每半页九行,每行十九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²书前有该年(丙午)冬高安朱吾弼序,书前或书末有正德三年戊辰(1508)婺源知县郭濂的刻书记,下卷正文末随接天顺七年癸未的丘濬

识语。³郭濂记说：

《学的》一书，琼台丘先生所集，木斋谢先生欲翻刻以广其传，弘治辛酉（十四年，1501），因朱夫子九世孙训导贞考满抵京，授以旧本，属归刊行，无何贞卒，未克归就。正德丁卯（二年，1507）夏，濂以钜鹿知县蒙钦调婺源，谒庙之余，贞子燔捧是书具言颠末，因命工绣梓，藏其家庙，俾世守之。⁴

朱吾弼序则说，书梓“藏於家，岁久湮漫，版几尽废。燔之曾孙诸生崇沐以锲（朱子他书），而并锲是集。”⁵由此可见，万历朱氏婺源重刻本据的是正德郭氏婺源重刻本，而郭本则是翻刻弘治十四年之前已经存在的“旧本”刻本。

这个旧刻本，正如郭濂记中所显示的，原本书名只有“学的”二字。这个书名，与弘治二年（1489）丘氏年轻好友程敏政（1445—1499）所作〈琼台丘先生文集序〉中“盖先生惧学者之无本也，则有《学的》之编”⁶一语所见的题名相同，也与丘氏卒後不久刊行的《琼台类稿》中〈学的後序〉一文的标题相合。⁷可见原来的刊本，只题“学的”二字。但“朱子学的”这个书名，却亦见称於丘氏的其他友人。弘治初年李东阳（1447—1516）作〈琼台吟稿序〉，便有“《世史正纲》、《朱子学的》诸书，多梓行于世”⁸之言。丘氏的同年至交何乔新（1427—1502）在丘氏卒後不久作其神道碑文，文中列举丘氏“行於世”的著作，也有《朱子学的》之名。何乔新所作碑文，是以丘氏门人蒋冕所作的丘氏行状为据的，似乎不应有误。⁹按此书成於天顺七年，下距李东阳作序时，超过二十五年，距何乔新作碑文时，至少三十三年，在这长时间内，凭著丘氏一直在翰林院、国子监和内阁的一贯学术声望，如果曾有多过一本刊行之事，似乎并不足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万历婺源重刻本题作《朱子学的》，虽非郭濂刻本的旧称，却也有所依据，不算出於杜撰。

但该本题作《重编》，又题朱吾弼所辑，却非十足的事实。因为正如下文将予析述的，此本的内容编次和比它早出的另一明刻本的编次，并不相异，而“辑”字之用，更属明显的错误。情形有可能是因前一年（万历三十三年）内府有重刊丘濬《大学衍义补》之举¹⁰，蔚为尊朱学者的盛事，朱吾弼因嘱朱崇沐在重刻朱子各种著作时，并刻丘氏《学的》，且为

之稍作校订，遂以“重编”命名，自高声价。也有可能由於身为南京监察御史的朱吾弼此时振扬朱学，曾授板朱崇沐令重刻专载朱子论学论古论政文字的《经济文衡》之故，¹¹因而身为朱子裔孙的诸生朱崇沐，故以“重编”辑者的名义，含混的归美於他。

这个万历婺源刊本，到了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被张伯行（1652—1725）在福州据以重刻，书名仍题《朱子学的》，卷端则书张氏“重订”，成为张氏《正谊堂全书》内的一种。正谊堂本的体式和万历本似应相同，只是每半页作十行，每行二十二字，有所不同。朱吾弼的序和郭濂的记，仍分别载於书前书後，只是朱序之前，冠以康熙四十八年的张伯行序，朱序之後，多了同年的张氏门人蔡衍铤序，并在蔡序之後，加入丘濬的《明史》本传。

正谊堂本的《朱子学的》流传较广，《四库全书》存目的此书，所据的便是这个刻本。¹²此本同治五年（1866）福州的正谊书局又有重校刻本，这重校刻本所在多有，民国五年（1916）福建经学会曾据之作铅字排印本，其体式和文字也与原本居然无异。¹³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也据之排印，并加断句，刊入《丛书集成初编》，成为现代的通行本。民国六十一年（1972）台湾刊行《丘文庄公丛书》本内所收的，也是这同治校刻本的影印本。

现存的另一个明刻本，书名但作“学的”二字。此本的正文编次及各篇条数，和万历婺源本的没有差异，但却没有序跋。二卷卷端分题“学的上”、“学的下”，其下均镌“丘濬辑”三字；每半页八行，每行十六字，黑口，双鱼尾，四周双边，板心有“学的上”、“学的下”字样；正文每则以圆圈分隔，不别起行；下卷末所载丘濬识语，均每则以一横画识始，则均与万历婺源本不同。更不同的，则是此本卷首刻有二图，前者题作《朱子小影》，朱子像上及两旁，并有赞语；後者题作《道统相传之图》，起伏羲而终朱子，也是万历婺源本及其传本所没有的。¹⁴

这个有图的明刻本没有见载於万历婺源本的郭濂记和朱吾弼序，并非现存刊本脱阙之故所致，因为现存的一个和刻训点本《学的》，正是它的全相覆刻。这个和刻本刊於日本承应二年（清顺治十年，1653），书末另页有“承应二年岁舍癸巳夏六月雒纳晚学石庵鹤信之训点铜驼坊

书林村上平乐寺刊”的刻书牌记。¹⁵它的书题、内容(包括卷首的两图)以及板式,和上述这个明刻本完全一样,可以反证它所据的明本,原来也是没有序跋存在的。

明刻本《学的》没有刻书序跋的现象,加上它的板式和字体的风格大类明代中期经子书刊的现象,显示了它的刊刻年代,无疑早於万历三十四年甚远。若从一个康熙二十五年(1686)或次年广东高州府刊行的《学的》来比证,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这个有图的明刻本《学的》的出现,至晚也必早於隆庆五年(1571)。这个清刻本的扉页镌有“丘琼山先生辑、朱子学的、高兴郡署刊本”字样。书前依次有〈旧序〉,末署“温陵史朝宜撰”,文後有按语简介史氏宦历:次为〈学的序〉,末署“广东高州府通判署知府事新安汪薰序”;次为〈跋〉,末署“提督河南学政参议道、前广东高州府知府王际有谨跋”;次为“参订姓氏”,列高州府属邑长官六名,校刊者汪薰弟三名、门人二名、子侄三名,及督梓者一名。以下接以《朱子小影》及《道统相传之图》二图,一如上述明本。其次即为正文,两卷篇目编次,卷端标题,行款字数,板式细节,以至书末丘濬识语,亦悉如明本,唯开卷书题下明本题“丘濬辑”,此本则改题“琼台丘濬辑、新安汪薰较”。¹⁶可见此刻虽然扉页及著录的书目均题作《朱子学的》,它所根据的,实际上却是和上述的有图明本《学的》属於同一系统;它的正式名称,亦即板本学上据以称名的卷端标题,其实也正只有“学的”二字。

这个“高兴郡署刊本”¹⁷的序跋,都没署上年月,但一经考证清楚,明本《学的》的流传情况,便更趋於明了。汪薰〈学的序〉¹⁸对於刊刻此本的背景,有如下之言:

《朱子学的》二十篇,琼山丘先生所辑,按察史公朝宜刻以行世,而流传甚少,学者多未尝经见。薰自弱冠时,先徵仕公手授,俾置几案,与诸弟奉以周旋,罔敢失坠。岁丙寅,始筮仕高兴。高兴僻处海滨,屡经兵燹,民风椎鲁而人不知学,思有以易之而未得其方。……薰生长於朱子之乡,来莅兹土,窃愿以平时所得於《学的》者,公之於人,敢附史公之後,付诸剞劂,以为後学之津梁。为此本书跋的王际有,¹⁹曾是汪薰的长官,〈跋〉中记及汪氏居官

始末,甚见称许;与本书刊刻有关的文字如下:

通守汪君晓世,与予同为江南人,有年谊。……守官数月,……适予除中州督学,遂代予摄署郡篆。……及予至中州,遣一介驰候,比书至而汪君已捐馆矣。……及椽归,送者充塞道路。……今己已秋,汪君叔弟晋贤北上,取道中州,欢然来访,出示君所刻《朱子学的》,……其用心可谓至矣。

合而观之,可见虽然述析中的这个印本必定晚於康熙己巳(二十八年,1689)王际有作跋之时,但汪氏的郡署刊本,则当成於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或其次年,而汪刻所据的,即是史朝宜的刊本。史氏在刻书的序(〈旧序〉)中说:“编(《学的》)得之於(丘濬)嗣人县尹名畴者,因刻而广之。”考史朝宜,福建晋江人(故旧序署“温陵”),嘉靖三十二年癸丑(1553)进士,隆庆元年至四年曾任广东琼州知府,四年至五年间升任广东按察副使、分巡雷琼道,万历三年至五年间又任广东按察使。²⁰丘畴名字见於《琼山县志》,为琼州府岁贡生,曾官思田知县。²¹按明代方面官刊刻地方贤俊著作之事,多由提学道官及按察司他官倡命,因此史朝宜刻刊《学的》的时间,最有可能的便是隆庆四、五年间(1570—71)他任分巡雷琼道之时。他据的既是丘濬裔孙丘畴的藏本,则如以上所论,可见丘家所藏的《学的》,与现存的明刻《学的》,并无二致。换言之,现存的明本《学的》,其刊刻至晚亦在隆庆之前。按前引正德三年郭濂刻婺源本《学的》记,明说所据书本,是弘治十四年“木斋谢先生”(当时的内阁大学士谢迁[1449—1531])授与朱贞以谋翻刻的“旧本”,由此可见,现存的这个书题“学的”而没有郭记的明本《学的》,即使不便是弘治十四年前的刻本,它的刊刻,至少也不会晚於正德三年婺源本出现之时。

明刻《朱子学的》有没有上述四种之外的刊本,由於没有存本可据,情况已难确知。比较明显的情况是,题作“学的”和题作“朱子学的”的本子,一直并存;前者万历中叶以前,尤为粤人所悉,後者则中叶以後,江南及岭南均多称引。这由以下的例证可以推断:嘉靖三十一年(1552)香山黄佐的〈琼台会稿序〉中,有“《学的》、《家礼仪节》先行于世”²²之言;次年(1553)丘氏的乡人琼山郑廷鹄作〈刻琼台会稿後序〉,

也有“尝忆吾贞范先生(在琼)都讲时,每以先生所著《学的》口授弟子,弟子往往能数言其义”²³之言。郑廷鹄嘉靖七年举乡试,嘉靖十七年成进士,其家与丘家同在琼城西厢,²⁴他的说话,更能反映嘉靖时琼州地方流传的本子是题作“学的”的。即使到了天启元年(1621)丘濬七世孙丘尔谷重编《琼台会稿》时,虽在他撰於山东宁阳公署的〈乞言引〉及在他所请的京官宜兴周延儒所撰的〈丘文庄公集序〉中,以“朱子学的”题称此书,但当时的另一序者福清叶向高以及天启三年(1623)作序的南海陈熙昌,则均仍以“学的”相称。²⁵从作序的时地来考察,称《朱子学的》者所知所见的本子,和前述万历三十四年的婺源刻本不无关系,如万历三十三年和婺源本序者朱吾弼同官南京的南京礼部尚书琼州定安人王弘海作的〈重刻琼台类稿序〉,文中也是以《朱子学的》相称,²⁶可见当时江南流传的,较多是题作《朱子学的》的本子。

现存的另一个清刻琼山丘氏刊本《朱子学的》,体式和上述的两个明刻本及二个清刻本又有所不同。此本卷首及正文均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一字,白口,单鱼尾,左右双边。乾隆三十六年(1771)初刻於琼山,促成其事的是当时提督广东学政的大兴翁方纲(1733—1818)。此书书版嘉庆二十五年(1820)作了校补,并由当时分巡雷琼道的仁和费丙章资助刷印,成为不改原刻内容旧贯而但加入题有“邱文庄公原本”和“石洲草堂校刊”字样的封面,以及费丙章嘉庆二十五年四月识语和负责“校补”、“监印”者姓名三页的校刊本。²⁷费丙章识此举之故说:

乾隆三十六年翁覃溪前辈校正重镌新版,仍藏文庄公裔孙士俛家,迄今五十年,间有残缺,坊间绝少刻本,琼山陈广文璋润出善本校补,请印发学官,以教多上。丙章心甚嘉之,因捐廉刷印,散给书院肄业生童。

原刻卷首有署乾隆三十六年“七月十日”翁方纲〈重刻朱子学的序〉;序後接以“附录七则”,录明代及清初人有关丘濬学问之言。次接《邱文庄公自识十五则》,即明清其他各刻附於卷末的丘氏识语,亦即一般称为〈学的後序〉的,该篇识语第十五则後有“乾隆辛卯(三十六年)七月十日”翁氏识语。再接目录,目录後复有同年“七月十一日”翁氏识语。此处识语述及此刻的由来甚详,而并不见於翁氏所著《复初斋文集》的刊本和手稿本,²⁸需

要稍详引录:

庚寅四月,三按琼试矣。试竣日,敬谒文庄祠,求问其家《学的》二十篇之板。序次残紊,爰语学官,俾其裔孙详加校刊,广为流布。今年秋,琼山弟子员[邱]士俛携此本来广州,谋重镌诸木。会其族子澄海学官绍先以所藏旧刻本并所抄本来合校,不期而集,方纲得以校正体式,付之使梓,诚幸事也。每卷末各本有注明分节者,又有未注明分节者;其卷内有注明几节者,又有未注者;检抄本与新旧二刻本,互有掙拄,此亦不知果出自先生手否?今姑依其旧,弗敢擅更也。监理缮刻工役者,则番禺学官莫崇义、琼州府学官陈国华,附识於此。

这段识语有二点应作说明:首先是翁氏所提的《学的》书名,应该只是简称;刻本书版上各处均镌《朱子学的》,可见丘氏家藏板本,未必便题《学的》。其次是翁氏据各本以“校正体式”之事,主要只是移旧刻见於卷末的丘氏识语於此刻的目录之前。其故翁氏有所解释,识於丘氏识後如下:

以上十五则,文庄自识,非序也。今集本目为後序,误矣。先生自云书於卷末,然今重刻是书,俾後人开卷识其大凡,故敬载於卷端,犹《法言》序之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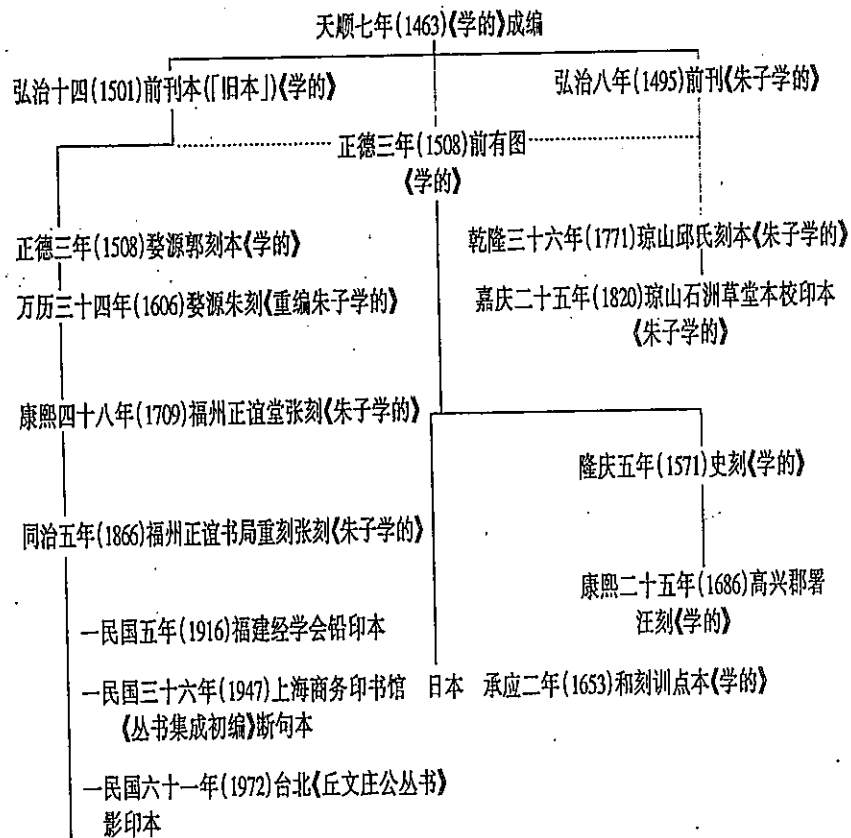
翁氏这个编次上的改动,确使此刻的体式特异於明清二代前此诸刻。至於识中“今集本目为後序”一语中的“今集”,则指的是当时已刊而翁氏能见的丘濬文集《琼台诗文会稿重编》或《丘文庄公集》,而非另一“集本”的《朱子学的》,因为文集内的这篇丘氏文字正是题作〈学的後序〉的。

翁氏识语中没有说明这个琼山丘氏家刊本所据以校刊的是那个或甚么样的板本。他这识语和书前的序文没有一言及於万历婺源本和康熙正谊堂本的传刻历史,也没有提及增加“附录七则”之事,而此书封面则有“邱文庄公原本”字样,可见此本所据的是一个异於婺源本传系的旧本。此本既题作《朱子学的》,书前又没有明刻本《学的》所有的二图,而《附录》所引题作“闽中何乔远邱文庄公传”和“关中焦映汉邱文庄公传”内的文字,明显出自康熙四十七年(1708)海南刊本《丘海二公合集》

中的《丘文庄公集》，可见此本封面虽题“原本”，其所据刊本则大概只是康熙末叶之刻，而不必是明刻的《学的》旧本，也不是康熙二十五年的高兴郡署刊本。按乾隆十一年丙寅（1746）孙人龙督学广东，曾因校正之故，“由雷赴琼，获睹[丘]文庄、[海]忠介合选八册，又得琼山《学的》一册。”²⁹由此推测，有可能在《丘海二公合集》出现的同时或稍前后，琼山还曾有刊行《朱子学的》之事。

翁方纲校正正式的琼山丘氏刊本，面貌自然和丘氏家藏的旧板不尽相同，正如翁氏识语所说，它是参校另一旧刻本和抄本而定的。其实琼山丘家原藏明刻丘濬诸书，清初时已有所损失。顺治十八年（1661）琼州定安知县王昌嗣作〈丘文庄公琼台会稿序〉，说他自己由于所官之地“竟去先生之里仅一衣带水耳，时过厥里，拜阙庙，搜先生之书而读之；诸如《世史正纲》、《学的》，兵燹之后，不无缺失”。³⁰时人所见如此，而以《朱子学的》而言，也可能由于书板有所损坏，而使印本流传甚为有限。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福建副使海康陈瑛（1656—1718）读正谊堂本《朱子学的》后作跋一首，文中说到他自己弱冠游乡校时，知有丘氏此书而未之见，及至入闽，“卒業吾师正谊堂刻本，始得见《学的》一书”，喜极而发出“吁，何幸哉”之叹，³¹并将自己“逐句点断”的读本寄给他在家乡的儿子。³²雷州半岛上的海康与琼山相隔不算太远，也是广州和琼州陆路必经之路，从陈瑛所言看，《朱子学的》在清初的琼州也不能多有，这也是我们推断翁方纲所说的丘氏家藏《学的》它所据的不是明刻本而是康熙末叶或稍后的刻本的旁证。

综上所述，《朱子学的》一书成于明天顺七年，原名只作《学的》，弘治十四年之前，异名的两本已经出现，其后各有传刻；现存的各本，基本内容相同，而乾隆三十六年琼山刻本体式特异。兹将此书版本及流传概况，再以下表综示；表中虚线表示间接或不能确定的传承关系。



三、《朱子学的》的评价

《朱子学的》在明清二代的朱子学派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除了显示于上文所述的此书流传情况之外，还客观地反映于以下二事。万历三十四年婺源朱子裔孙重刊朱子的各种著作，包括《语类》、《近思录》、《全集》、《楚词注》、《家礼》、《韩文考异》，同时还刊刻了二种采辑朱子文字的编纂，即朱子门人滕珙编辑的《经济文衡》和丘濬编辑的《朱子学的》。³³前者所载以朱子的成篇文章和书信为主，后者则以朱子的片段言语为主。康熙四十六—五十二（1707—1713）年间张伯行刊行

《正谊堂全书》，选刻朱子後学的论著数十种，《朱子学的》也在其中。如果我们认识到万历婺源朱氏重刊朱子著作时，宋元明三代节录朱子言语的编纂已经存在多种的事实，³⁴和《正谊堂全书》内的著作，多属张氏选录节本，甚且有由张氏补辑增定之作，³⁵而《朱子学的》却为全书刊刻的事实，那么《朱子学的》在万历中至康熙末百余年内为朱子学者所重视的情形，也就可以不言而喻了。

事实上，张伯行给予此书地位，是极为崇高的。他认为：“夫朱子之的，固周张二程之的，周张二程之的，固孔曾思孟之的也。朱子集周张二程之言作《近思录》，为孔曾思孟之阶梯，文庄作《学的》，为周张二程之阶梯。学者诚由《学的》以求周张二程，从《近思录》以求孔曾思孟，而由是以造乎圣人之道，犹善射者操弓挟矢，命中於百步之外，吾知其必有合也。”³⁶依照他的看法，《朱子学的》和《近思录》虽有时代先後之别，但在追求孔孟之道上而言，实不啻为一体之相连，合成从事圣人之学的同一阶梯。张伯行把《学的》地位提高到和《近思录》并列的这个看法，是基於朱子道学是实传孔孟之道之学的信念而来的。从这点看，他对《学的》在理学学问中的成就和所应得的地位的评价，和其他明清学者的认识和评价，是一致的。正如明人史朝宜所说：“学者由是编以会朱子之意，则入道之门，一开卷而尽得之；”³⁷也正如朱吾弼所说：“《学的》盖[丘濬]以己之得於先生[朱子]者，而欲後人皆有以知先生；非知先生也，知圣人之学之的也。知先生之的则知学，知先生之学则知圣人。”³⁸总之，论其用途，则如前於张伯行的汪薰所说，可“以为後学之津梁”；³⁹论其重要，则如後於张氏的黄芝所说，“可以见朱子之学，即可以见圣人之学。”⁴⁰难怪张氏的门人和下属、深获清圣祖赏识的陈瑛，会在其《寄子书》内说：“《朱子学的》，内圣外王道理，无一不备，是儒者有体有用之学，非但有益作文而已；予逐句点断，易看易读”，并且寄回要他“细细看过”了。⁴¹

正因为有了朱子之学是体用兼该的内圣外王之学这种见解和信念，在朱子学同时也是朝廷崇重之学的环境中，被认为能得朱子之意的《朱子学的》，也因此被著重思想教育的大小地方官员视作有裨风教、可助化民之具，而乐于为之刊刻传布。隆庆间任广东按察副使的史朝宜，

便是认为学者若由此编入门，“将终身服行之不暇，又何暇剿於异说以呶之哉，”⁴²因而为之重刻。康熙中任高州府通判的汪薰，是精读《朱子学的》的过来人，他刊刻高兴郡署本《学的》，是基於这样的原因和信念的：“高兴僻处海滨，屡经兵燹，民风推鲁而人不知学，思有以易之而未得其方。夫古人之学，必先事其身之所得力以及诸人，则《学的》者诚入德之门，而化民成俗之要务也。”⁴³康熙晚岁任福建巡抚的张伯行之刻《朱子学的》，则因感於“迨金谿之学盛，姚江新会并起争衡，群言淆乱，莫知所宗，学者罕能窥於道德之源，”而希望“学者省括於度，以从事於是编，精於思而不惑，纯於气而不乱，其知之明，极於穷神达化而无所不通，其才之充，推之修齐治平而无所不得，其道之行，至於化俗，其教之成，至於动众，则朱子之学亦藉是以麤明。”⁴⁴嘉庆末年资助校印石洲草堂本《朱子学的》的雷琮道分巡费丙章，则有感於时俗之读《四书》，只为制艺之故，科名是图，“以至圣贤之道，均未身体力行，无惑乎志向日卑而真才不出，”而认为欲“正学术，端士习，[则]舍《朱子学的》一书其何所适从，”因而“捐廉刷印，散给书院肄业生童，俾士子知所趋向，为学之的在是，即为人之的亦在是矣。”⁴⁵从宏观的角度来看，以上这些时期不同而地位职责均有差别的地方官员的作为，不论其出发点是否囿於崇程朱以抑陆王的宗派意念，或是志在维护朝廷功令之下的科举学术，都反映了他们持有欲善举子士习乃至科举制度本身，必须加强士子对朱子学术要义的基本认识的一种看法。由此演发，他们於是认为《朱子学的》具有教育用途，具有由教士而达化民的潜在实用价值。

《朱子学的》这样的受到明清朱子学者的称许和重视，无疑与此书在当时科举制度下所明示的尊朱意旨大有关系。尊朱学者以之为赤帜，以之为返本培元的单方，已如上面所述，但尊朱的宣示和尊朱所反映的本书结构外貌，却并不是也不能解释此书所以成功的原因。事实上，明代中叶以降到盛清乾隆初期的二百五十年内，其间像《朱子学的》这样的选采朱子言语编纂成书，以表述朱子学说的尊朱之作，为数实在不少。《四库全书》馆臣所说“指不胜屈，几於人著一编”⁴⁶的情况，自然是夸张过甚之词，但曾经《四库》著录和存目的，还有多种可见梗概。⁴⁷它们或依《近思录》的体裁和篇目，或采与《朱子学的》相近的义例，或沿

用《朱子晚年定论》的形式，皆称能得朱学之真精。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它们大都不传，早成稀罕之物。像万历三十年(1602)高攀龙(1562—1626)所纂的《朱子节要》，在明末甚享盛名，现在却难於一见。⁴⁸反观《朱子学的》，却始终屹然存在，流传不失。这正反映了它必有卓然优越於同类书籍之处，而单纯或表面的尊朱，并非其成功之所在。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对《朱子学的》有所指责，成为本书仅见的讥评，其文如下：

是编上卷，分〈下学〉、〈持敬〉、〈穷理〉、〈精蕴〉、〈须看〉、〈鞭策〉、〈进德〉、〈道在〉、〈天德〉、〈韦斋〉等十篇，下卷分〈上达〉、〈古者〉、〈此学〉、〈仁礼〉、〈为治〉、〈纪纲〉、〈圣人〉、〈前辈〉、〈斯文〉、〈道统〉等十篇。蔡衍铤序曰：‘上编自〈下学〉以至〈天德〉，由事而达理，而终之以〈韦斋〉，所以纪朱子之生平言行，犹《论语》之有〈乡党〉也。下编自〈上达〉以至〈斯文〉，由理而散事，而终之以〈道统〉，所以纪濂洛关闽之学之所由来，犹《论语》之有〈尧曰〉也，然濬阐朱子之言，以示学者，即仿朱子编《近思录》、《小学》之体足矣，何必摹拟《论语》，使之貌似圣人。况扬雄、王通之僭经，朱子尝深讥之，濬之是编，岂朱子所乐受乎？’⁴⁹

这篇提要的重点，明显在於反对丘濬极度尊崇朱子，乃至透过此书而使朱子貌似圣人之事。孔子之後只有朱子一人的这个主张，《四库》馆臣是不能接受的。馆臣的讥评是否有当，这是个属於思想文化价值判断的问题，我们可不置论，但他们在发表批评之前，不厌其详的标列此书的全数篇题和引述蔡衍铤序所提示的此书分编属篇的含意，却无意中反映了他们对此书的组织尤其重视之意。可惜他们碍於主见，再没对此书各篇具体内容的长短有所评论。

其实《朱子学的》得以长久流传的真正关键，正是在於它的选材和编次二处。选材关乎朱子学说的内容，编次则关乎阐述朱子学说的组织。两者的总和，不独验证了编者丘濬对朱子整体学说的掌握程度，也决定了导引读者理解朱子学说旨要和评衡其逻辑强弱的程度。关于这两点，古代中外学者的看法颇为一致，都是好评。除了见於本

文以上所引序跋的，还有二说，可以举概其余。明儒顾允成(1554—1607)曾给高攀龙寄赠《学的》二册，附信并说此书“殊有条理，文试阅之何如。”⁵⁰有条理自有内涵，顾氏对此书的看重，不啻溢於言外。和刻鹤信之训点本《学的》後，有汉文识语说：“毕竟节无大过，文无不及，天理之节文，恰好之处也”，强调了此书取材之恰当。对於《朱子学的》内容和组织的分析和评论，笔者已在另文有所处理，就其所得而言，顾允成和鹤信之(?)的评论，是公允而恰当的。总的结论，正如本文开端所说的，丘濬此书，是给朱子学说提供了一个系统周延而繁简适中的读本，确有助於学者理解朱学的要旨和进入研究朱学精义的途径。

四、结语

本文在能够掌握的文献范围内，述论了《朱子学的》明清二代各种版本及其流传系统，以及二代学者对此书的各方面评价，从而显示了此书在朱子学派内，一直占有崇高而重要地位的事实。此书三个已知的传刻系统和十个现存可见的板本，和丘濬本人其他著述的传刻情形相比，并不见其特出，但与他人同类的编纂比较起来，却已出类而拔萃。它的成功之处，归根到底，在於丘濬对於朱子的学问，确有深切的掌握和见地，因此能够选精而编贯，把朱子学说的系统和精要，在初学者能够实际承受的篇幅内，给予了适当的表述。

丘濬辑《学的》以拟《论语》，强调并非如王通拟经之作，却不讳言自效有子曾子门人的所为，径推朱子直继孔子，⁵¹他的尊朱程度，实为前所未见。但从《学的》的成就来看，他的尊朱实属名实相符，绝非限於意态而已。朱子没有阐述一己全体学说的著作，丘濬辑《学的》以充之，首先为朱子学说建设了一个明了而可学的体系。这是他对朱学的极大贡献，他可以说是朱子的功臣。

《朱子学的》之受重视而得以流传，主要得力於它的选材和编次。丘濬在此处的成就，和他的时代学术和个人学养都有关系。他纂辑《学的》的时代，朱陆异同之论，早已存在，但正如张伯行序所指出的，当时陆学未盛，陈王未兴，所以丘濬的尊朱动机，是比较单纯的。前引程敏政说：“先生惧学者之无本也，则有《学的》之编”，可以说是精简有当，深得丘氏之心的代表性看法。丘氏既以朱学为本，他所关心的只是尽

量阐明朱学所以足学之处,因此对于藉以尊朱,以示为学根本的《学的》的命意取材,也能自然而然的趋于精审和公允,不必如王学盛行之后,那些像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和陈建《学菴通辨》之类的纂述,各为敌说所囿也各因敌说而取材立论,名为尊朱而述朱,结果却是即朱而离朱,对于朱子全体学说的阐明,不能作出客观近是贡献。这样看来,丘濬还可说是朱子的忠臣了。自然也正因丘濬自己学有本源,所以才能够编出给学者提供立本之道的书籍。《朱子学的》一书的表现,即是丘濬本人有得于朱子之学的表现,这个历来论者的持论,无疑将仍颠扑不破。

注:①本文「引言」所论及其引文,均据朱鸿林,〈丘濬《朱子学的》与宋元明初朱子学的相关问题〉(1994年12月12日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岭南文化新探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发表);林天蔚主编,《岭南文化新探究论文集》(香港:现代教育研究社,1996),页63—79。

②此本以上版本资料,据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整理研究所编,《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页95,〈子部儒家类〉《重编朱子学的》条。

③此本人民大学藏本,近因所藏图书馆迁馆未见。此处有关朱吾弼、郭濂及丘濬各人序跋文字的位置,系据此本康熙正谊堂传刻本所载推论。

④《朱子学的》(同治五年福州正谊书局重校刊),卷末。

⑤同上书,卷首。

⑥《琼台诗文集稿重编》(天启三年刊本清初印本),卷首。

⑦丘濬,《琼台类稿》(弘治间刊本),13:8上—10下;《琼台诗文集稿重编》,9:30下—33下。

⑧《琼台诗文集稿重编》,卷首。

⑨何乔新,《椒丘文集》(嘉靖刊本),30:19上—24上,〈赠特进左柱国太傅谥文庄丘公墓志铭〉。铭文云:“(丘濬子)曾遣使以公门生翰林院编修蒋冕所述行状求玄堂之铭”,故知此铭之所据。按:蒋冕《湘皋集》(嘉靖刊本)未载何氏所言〈行状〉。

⑩事见《明神宗实录》(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416:24上(页7859),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己未条:416:25下—26下(页7862—64),万历三十三年十二月壬戌条。神宗命司礼监重刊是书,阁臣撰御制序,序载壬戌条。万历内府原刊本及崇禎间陈仁锡刊评本《大学衍义补》卷首,均有此序。

⑪朱吾弼撰序并校板朱崇沐重刻读书事,见《经济文衡》(万历三十四年刊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首朱吾弼序。

⑫永瑢、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万有文库》本),第18册,页95—96(子部儒家类存目一),《朱子学的》条。按:提要引蔡衍饒序,故知所据为正谊堂刊本。

⑬福建经学会铅印本《朱子学的》,笔者所见系台北台湾大学图书馆藏本。

⑭明刻本《学的》现藏北京图书馆。本文所言此书体式及板本情状,系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祖武教授先后检视原书及与和刻本《学的》书影对比结果而定。多承陈教授惠助,谨誌感谢。

⑮点本《学的》,笔者所见系台中东海大学图书馆藏本。

⑯高兴郡署刊本《朱子学的》现藏北京图书馆。本文所述此本体式、板本概况及所引序跋文字,均承陈祖武教授检抄所赐,谨誌感谢。

⑰高兴郡,三国吴置,晋代省去,治地在明清高州府东境,汪薰盖用古称。

⑱汪薰序署新安人。按:光绪《高州府志》(杨栗修、陈兰彬等纂,光绪十五年刊本),21:9上(取官表四·通判),作“汪薰,嘉兴监生,(康熙)二十五年任”,名籍稍异。汪氏或以从学仕进之谋,寄籍嘉兴,故《府志》不作婺源(新安)。此本《参订姓氏》列其“胞弟”三人,汪文楨书《嘉兴府籍岁贡生》,汪森书《山东籍壬子贡生》,汪文柏书《钱塘县籍贡监》,又其子汪耀则书《德清县籍贡监》,姪汪为喜书《浙江杭州府学庠生》,汪维景书《浙江秀水县学庠生》,均籍在他处,情形与之相同。《高州府志》同表汪氏次栏书“潘琦,南城廩监,二十七年任”,而此本王际有序谓汪卒於任上,则汪在高州通判任,殆约二年而已。

⑲光绪《高州府志》,21:9上(取官表四·知府),书“江南丹徒人,进士,(康熙)二十二年任。”

⑳史朝宜简单官历,见此本〈旧序〉后按语。其在广东各职及任期,见道光《琼州府志》(明谊修,张岳崧等纂,道光二十一年刊本),23:27下(取官·知府),23:24下(取官·按察司副使);同治《广东通志》(阮元修、陈吕齐等纂,193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同治三年刊本),20:372(取官表十一,按察司按察使)。按:《琼州府志》知府表隆庆朝只有二名,史氏名在首位。同志副使表於史氏任期,但书“隆庆间任”。据表,隆庆朝此职共有四名,史氏之前为陈复升及顾可久二人,表於陈氏书“二年任”,顾则未书,照明代分巡副使多人年一任之例,史氏殆隆庆四年始任该职,次年则升浙江参政。《广东通志》按察使表书其“(万历)三年任”;下任刘志伊,未书任年;又下任滕伯伦,书“五年任”。

㉑见咸丰《琼山县志》(李文恒修,郑文彩等纂,咸丰七年刊本),16:4下(选举五·选贡)。据表,知丘畴出身府学岁贡。按:表但注丘畴官恩田知县;其为丘濬裔孙,唯见史朝宜此序。

㉒《琼台诗文集稿重编》,卷首。

㉓同上书,卷首。

㉔咸丰《琼山县志》,15:19上(选举三·举人),15:8下(选举二·进士);进士表注其为“西廨人”。

㉕丘尔谷〈乞言引〉及周延儒、叶向高、陈熙昌等序,均见《琼台诗文集稿重编》卷首。

㉖同上书,卷首。

②石洲草堂校刊本《朱子学的》现藏广州中山图书馆。本文所用该本卷首资料，系承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胡守为教授寄赠，谨誌感谢。

③翁方纲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至三十六年(1771)视学广东，前後共八年，其中二十九年甲申(32岁)，三十年乙酉及三十五年庚寅，三度按试入隸，均赋诗颇多，见於《复初斋诗手稿》各年稿本之内(翁氏诗稿文稿手稿本，均有魏锡曾题记，台北文海书局《清代稿本百种汇刊》合一影印，题作《复初斋文集》)，嘉业堂丛书本《复初斋集外诗》均未刻之。〈重刻朱子学的序〉及刻本识语，则手稿本《文集》及嘉业堂本《集外文》均未见。

④见陈璘，《陈清端文集》(同治七年重刊本)，卷首，孙人龙〈序〉。

⑤《琼台诗文会稿重编》，卷首。

⑥陈璘，〈朱子学的跋〉，见咸丰《琼山县志》，27:29上—31上。按：此文《陈清端文集》未见。陈璘康熙四十八年任提督四川学政，次年因福建巡抚张伯行奏荐，升补福建按察司副使，故於张称师；其乡会试座师，张均不预；详见丁宗洛编，《海康陈清端公年谱》(道光六年刊本)。

⑦《海康陈清端公年谱》，下：24上—下，康熙五十三年59岁条内〈寄子书〉。按：此书《陈清端文集》未见。

⑧此据《正谊堂全书》本《朱子学的》卷首所载万历三十四年朱吾弼序。

⑨宋元二代情况，见朱鸿林，上揭文。万历中以前之明代概况，略见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5、96(子部儒家类存目一、二)。

⑩如《道统录》一书，本明潞州仇熙所著，“上自尧、舜、禹、汤、文、武，下及周、程、张、朱，君相师儒，为治为教，统而一之，而假与似者不列焉”，张伯行“读而善之”，而以为未备，“用为采辑《易传》、《尚书》及诸家传记，上自伏羲、神农、黄帝，下仍论於周、程、张、朱，增定成书，使学者得观其备焉。”《正谊堂全书》本此书，盖亦题张氏所著；引文即出张序。

⑪《正谊堂全书》本《朱子学的》，卷首，张伯行序。

⑫高兴郡署刊本《朱子学的》，卷首，史朝宜〈旧序〉。

⑬《正谊堂全书》本《朱子学的》，卷首，朱吾弼序。

⑭高兴郡署刊本《朱子学的》，卷首，汪森序。

⑮吴道烺辑，《广东文微》(香港：珠海书院，1978)，52:322—323，黄芝〈书琼山邱氏朱子学的後〉。

⑯同注32。

⑰同注37。

⑱同注39。

⑲同注36。

⑳石洲草堂校刊本《朱子学的》，卷首，费丙章序。

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8册，页95、96(子部儒家类存目一)，张伯行《续近思录》提要中语。

㉒概况略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93、94(子部儒家类三、四)，卷95—98(子部儒家类存

目一至四)。

㉓此书连《四库全书》也没有著录。其概况可参《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2)，第10册，页1044—45，“满汉合璧朱子节要”条。高攀龙自序，见高氏《高子遗书》(《文渊阁四库全书》本)，9上:3上—4上；又有顾宪成序，见顾氏《泾皋藏稿》(《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1上—2下。

㉔《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8册，页95—96(子部儒家类存目一)，《朱子学的》条。

㉕顾允成，《小辨斋偶存》(《文渊阁四库全书》本)，6:25下，〈简高景逸大行〉。按：此书或与高攀龙纂《朱子节要》事有关，其寄书年代待考。

㉖见《朱子学的》下卷终丘濬自识第一、二则。

朱鸿林，祖籍广东惠来，香港生长。香港珠海书院文学士、硕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博士。曾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员、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学组主任，现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兼任研究员。曾获选为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驻院学人，获颁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度校长模范教学奖。专门研究领域为明史、近世中国思想文化史及社会制度。1984年博士学位论文(英文)题为《丘濬与大学衍义补：十五世纪中国的经世思想》，已刊著作有《明儒学案点校释误》等中英文专书两本，研究宋元明儒者、明人著作、明代经筵、明代乡约、孔庙从祀等中英文学报论文四十多篇。